

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五分册

(内部读物)

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五分册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五分册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1964年11月第1版

1964年11月上海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2074·291 定价：1.40元

編 者 說 明

本书是《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作者卡尔·考茨基(1854~1939)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之一。这本书出版于1927年,是一部集其修正主义观点之大成的长篇著作。原书分一、二两部。由于原书篇幅过大,中译本把它作六个分册出版。

本书系内部读物,公开引用译文时,請仍用原著版本,并請复查原文。

由于我们人力和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卒,翻译上可能有不少缺点,敬希读者指正。

《哲学研究》编辑部

1964年6月

目 录

第四卷 阶级和国家(下)

第六篇 城市国家	3
第一章 城市国家的起源	3
第二章 城市国家中的阶级斗争	11
第三章 城市国家中的民主与剥削	20
第四章 国家的混合形式	31
第五章 城市国家的没落	38
第六章 古代社会主义	47
第七篇 资本主义工业国家	55
第一章 工业资本主义	55
第二章 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力量	61
第三章 资本主义精神	67
第四章 中世纪的国家与城市	73
第五章 自由劳动	81
第六章 禁欲主义	88
第七章 工业资本的兴起	96
第八章 进步与社会革命	104
第九章 现代民主制	110
第十章 民主国家中的资本	118
第十一章 民族国家	126
第十二章 国家机器的成长	136
a) 军队、交通、关税	136
b) 教育、司法、卫生事业	141

c) 稅收	147
d) 國家性質的轉變	149
第十三章 作為職業的政治	150
第十四章 暴力與民主	161
第十五章 異能	171
第十六章 知識分子	181
第八篇 階級和國家的消滅	195
第一章 無產階級的衰落	195
第二章 無產階級的上升和爭取民主的鬥爭	201
第三章 無產階級的上升和縮短工時	211
第四章 無產階級的勝利	220
第五章 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	228
第六章 埋葬資本主義	237
第七章 危機	241
第八章 資本積累的限制	246
第九章 農業中的積累	253
第十章 社會主義必然實現的前提	260
第十一章 階級對立的尖銳化	264
第十二章 經濟與政治	279
第十三章 生產社會化的條件	288
第十四章 國家的轉變	301
第十五章 國家的消滅	306
第九篇 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動力的論述	319
第一章 再談馬克思的序言	319
a) 歷史上的階級鬥爭	319
b) 經濟變革對於意識形態的反作用	326
c) 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327
d) 任何新的生產方式都受物質條件的制約	330
e) 人類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	332
第二章 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進一步發展	334

第 四 卷

階級和国家 (下)



第 六 篇

城 市 国 家*

第一章 城市国家的起源

以上我们主要是讲了讲这样的国家，即，在东方广阔的河流平原上，从北非到中国这段乾燥的狭长地带，由于和平的农民和好战的、掠夺成性的、到处游浪的牧人比邻相处而形成起来的国家。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这是国家的最初形式，而正是这种形式的国家，首先创造出了我们称之为国家成果的那些高度文明。

可是，这种形式的国家并不一直是唯一的国家形式。在别的地方条件下也出现过别种国家，不过，所有这些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例如东方的专制国家，都是建立在外来部落或部落联盟对土著农民的统治上的。

关于由土著人形成起来的美洲国家，我们知道的太少，因而无法探讨猎人而不是牧人是怎样进行征服和奴役的。这些国家对于一般人类发展的影响极其微小，这里可以撇开不谈。

另一方面，却有一些国家对于一般人类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些国家和东方国家的差别比美洲国家和东方各国的差别大得多，可是又和东方国家有着同样的起源，因为它们也是在农民与牧民的对立情况下产生的。

至少，我对希腊各国的形成是这样理解的。它们不是由“海盗”，

* “城市国家”，一般历史书亦译“城邦”。在本书中为行文方便，两个词通用。

就是说,不是由来自海洋上并征服了当地居民的占领者,而是由从北方移居到当地的游牧民族建立的。这些民族大概同样是被其它民族从他们先前的居住地赶出来的。因为希腊土地的肥沃程度还不致于引诱得动他们。那里的土地非常贫瘠。

侵入这里的是印度日耳曼民族,是游牧民族,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文化不低的定居民族,他们征服了这些土著,并且在这些人的土地上建起了国家。那里有许许多多通海的河谷,他们在每一个河谷里都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国家。

在本书的第三卷第一篇第十一章中,我们就已经提到贝洛赫的说法,即希腊人身上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东西都来自长着金黄色头发的入侵者——雅利安人,而其种种道德上的缺陷,则都来自那些本地人,入侵者和这些不但长黑头发、而且显然还有一颗黑心的本地人杂处着(贝洛赫《希腊史》第一卷,第93—95页)。当然,没有任何根据能够证明这一个或者那一个民族的本来性格是什么。但是,有着强烈的雅利安人情感的人显然是会赞同这种说法的。贝洛赫在其书的前面(第66页)就曾强调指出,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一个民族能够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文化:“我们雅利安人”。

根据各方面的估计,民族大迁移是在纪元前三千年发生的,并且延续了好几百年之久。各个部落的推进是缓慢的、逐渐的。

对希腊大陆的占领大约是在纪元前三千年和二千年之交完成的。

在同一时期来自北方的其它希腊游牧民族就在小亚细亚海岸的北部定居下来。从公元前1600年开始,希腊大陆的占领者才敢于来到海上,才成了“海盜”,作为海盜,他们占据了各个岛屿以及小亚细亚海岸的南部各地区。

希腊大陆上国家的形成主要地说和东方的情形一样。与国家形成相联系的阶级分化也是如此。象荷马诗篇所描述的那种古希腊社会的最初情景,使我们看到好战的土地贵族作为统治阶级统治着须为他们服役和纳税的农民。这种贵族有一个首领,即国王,不过,国

王的权力同贵族的成员们相比较却很微小。

但是，希腊的自然条件，比起东方广大河流地带的条件，性质完全不同。单就数量上来说，这里的条件与那里的就有差别。这个量的差别又转化成为质的差别。

东方大河流域可以使千百万人民的劳动换来丰富的收获，这些人民没有被巨大的自然阻碍隔离开来，因而能够容易地被一个占优势的力量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另一方面，与河谷接壤的又是些广阔的平原，许多掠夺成性的部落可以时常骑着轻快的骏马不太费劲地在这些平原上聚合起来，侵入富饶的庄稼地带，使之听候自己役使。

在这些条件下，就形成了一些大国，由许多收入丰富、势力强大的贵族统治着，而这个统治权，最后又从贵族手里落到了专制君主的手中。

地方不大的希腊的自然条件，就完全是另外的样子了。它的境内贯穿着无数峰高谷深的山脉。它被割裂成无数狭小的，大抵是贫瘠的地带，每一个地带只能养活少数的人；而且道路崎岖，陆地上不易通行。

希腊只有少数国家的土地面积达到一千平方公里以上。因此，那里的居民就只能为数很少。

农作物收成不好，农民贫穷，除耕作外，还要多多依靠畜牧业过活。这些农民比纯粹种庄稼的农民要勇敢善战。每个地区都被一些难以通行的山脉与邻区隔开。各个地区是不会由于自然财富而诱致邻区来奴役自己的，因为假如要进行奴役那就只有通过残酷的战斗。

斯巴达人占领了希腊最大和最富的河流地带之一——欧罗塔斯(Eurotas)河谷，成了希腊陆地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的阻碍，就连他们也对占领其它地带感到困难。

斯巴达人居住的拉哥尼亚地区，面积是五千八百平方公里，公元前四百年光景，那里人口大概是二十三万人，其中有一万人是斯巴达人。凭着他们的优越条件，斯巴达人曾试图并吞邻区。但是他们也

只对他们的西邻美塞尼亚人实现了这个企图，就连这个也是经过了可怕的几十年之久的战斗才办到的。继这些战斗之后，被奴役者也还经常不断地进行着反抗斗争。斯巴达人尝够了战争的滋味。他们对东部和北部继续扩张的企图都告失败。亚哥斯和阿尔加狄亚保卫住了它们的独立。阿尔加狄亚最后总算以同盟者的身分承认了斯巴达的霸权，即领导。可是对于亚各斯人，那就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在希腊保持着独立的整个时期内，它分裂为许多小国家，每一个小国家都执行着它独特的政策，并且，即使有时候遭遇到巨大的共同的危险，比如说波斯人的入侵，它们也不能团结一致。造成这种分裂状态的，是国家的特性，而不是种族的特性。

每个地区只有很少的人从事农业，他们生产的粮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奴役这些人民的入侵者，也只能是少数，入侵者从农民那里剥削所得也很微少。

贵族统治者也常常被迫在种地和盖房屋时亲自动手。

想通过掠夺邻区来改善本区农业收入的贫困状况的希望愈小，剥削者就愈益感到非到海上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不可。在希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连接着海。向海洋扩张，这是东方的专制暴君所考虑不到的，他们只力求增加能为他们服劳役的农民的数目。

要成为一个航海家，单凭居住在海边是不够的。正是沿海的居民才知道得最清楚，海洋狂暴起来是多么可怕，它的脾气又是多么难以捉摸。罗马诗人贺拉西就认为敢于到变幻莫测的惊涛骇浪中去冒险的人，一定是用三重铁甲武装起胆子的人。只有在闹严重饥荒生活不下去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去冒险航海寻找食粮。

罗伯逊提醒我们的下列事实是值得重视的（《国家的演变》第369页）。

公元五世纪时占领了英国的盎格罗萨克森人，是从佛里斯兰来的，他们当初也是被赶到那个贫瘠地区去的。但是到了不久，那块土地就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居民的需要了。土地出产养活不了的过剩人口，于是就试图依靠海上捕鱼来维持生活。等到这部分人在捕鱼

时获得了足够的航海知识，他们就试图以海上盗劫来维持生活。

他们是作为海盗来到英国的，但到了那里，他们发现有富饶的土地，可以依靠庄稼来建立舒适的生活，于是他们或者做了自由农民，或者做了奴役农民的剥削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忽视了早已非常熟练的航海事业。所以当时的英国，还远不是一个航海国家。公元九世纪，当诺曼人作为海盗掠夺英国沿海时，英国对他们是毫无防御能力的。盎格罗萨克森的国王阿尔弗烈德大帝 (Alfred der Grosse, 871—901)，为了抵御诺曼海盗，建立了一支舰队。但是为了人员配备，他不得不去招募佛里斯兰的海盗。在英国本土，他找不到足够的海员。

希腊人之中也只是居住在土地贫瘠的地区中的人才这样被迫成为卓越的航海者的。希腊的航海能手，都不是来自拉西第蒙的肥沃的欧罗塔斯河谷，更不是来自希腊东部最大河流之一，帖撒利亚的佩涅欧斯河的广阔膏腴平原。

在那些地方，农业始终是居民最重要的生活来源，所以，社会的封建特性也保持得最完整。帖撒利亚这个地方很少有机会影响真正的希腊的情况。后来，它正和斯巴达一样成了希腊社会中贵族保守势力的荫庇所。

另一方面，希腊大部分其它地区，只要不象阿尔加狄亚那样处于内陆，早就发展了意义重大的航海事业。在从事航海活动的各地中，起初是亚哥斯最强大，后来是雅典。

起先捕鱼可能是人们向海洋发展的主要动机。我们从近代国家荷兰和葡萄牙那里知道，它们的海军就是在渔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希腊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

“从前依奥尼亚人所能获得的利益没有别的，就是捕鱼的收入。春季从彭托斯涌入波斯普鲁斯海峡的稠密的金枪鱼群，很可能是促使依奥尼亚人继续航行去追索这种天赐恩惠的来源的主要原因……作为渔民，依奥尼亚人熟悉了北部的海洋，于是就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其他对象上。”(库尔提乌斯：《希腊史》第1卷第337页)

这里，库尔提乌斯讲的是促使希腊人远航黑海的动机。但是，他们开始远航南部海洋恐怕也出于同样的动机。

与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一样，希腊人也同样不只限于捕鱼，而是利用了他们通过捕鱼取得的航海知识，去进行其他有利可图的活动。他们从一个岛航行到另一个岛，终于来到了富饶的小亚细亚海岸，那里受着东方文明的影响，蕴藏丰富。这些宝藏诱使他们进行掠夺，或者，如果力量对比不允许他们劫掠，他们就用本国或西方国家、特别是意大利的产品去换取这些宝藏。海上劫掠，自营贸易，以及转口贸易，终于给希腊人带来了远远超过农业生产的优厚利润。以东方为榜样，商业国家不久也发展了自己的出口工业。

当然，最先占有这些财富资源的是国家的统治者们，即军事贵族和他们的首领或者国王。他们以统帅的身分率领他们的下属进行抢劫，把虏掠得来的绝大部分战利品塞进自己的腰包。

麦克斯·韦伯在他的《经济史》(第80页)中写道：

“在希腊人那里最初大概是城邦的国王拥有船只，而且是既为了进行物资交换，也为了海上掠夺。但是他无法阻止豪门巨族成长起来同自己并驾齐驱，他们也拥有了船只，并且最后他们只不过还把他看成是为首的伙伴而已。”……

实际上，这些豪门大姓，这些贵族，其实力地位就是在希腊也不是以占有船只为基础，而是首要并且一直是以占有土地为基础。这在当初是最高贵的真正贵族式的占有形式，并且始终如此。希腊国家开始时都是陆地国家。它们的贵族都是从陆地侵入的占领者。在国家转入航海国家之前，豪门巨族早已在这个国家中据有了很高的地位，他们不是依靠航海才起家的。

不靠军事贵族，国王是不能进行海上战争的。当商业取得了重要性时，他就象东方的国王那样力求进行商业垄断。可是在这方面他必然会遭到豪门巨族的反抗，比起他们来，国王可以说只有微不足道的力量。

象在希腊的陆地国家那里一样，在航海国家中，贵族主要仍旧是

地主和军人。在航海国家,正如在陆地国家中那样,贵族们是轻视商业的,这就是说,他们之轻视商业,只是轻视积极地参加商业活动,并不是轻视把经商的利润塞进腰包。他们试图用装备船只,给商业活动资助商品或金钱的方式来获取这种利润,至于商业活动本身那就交给特地为此而雇佣的、非贵族的人去进行。他们从一开始就允许这些人去进行商业,自己则利用投资来参与其事。

总之,随着时间的进展,在贵族以外,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商人阶层。同贵族一样,这个阶层的财富和势力也在增长着。

财富的不断增长却带来了这样的危险,那便是,强盗自己遭到抢劫。只要贵族们还仅仅依靠他们那些在希腊必然面积很小的地产来过活,并且生活得很贫困,就不会有人想去抢劫他们。从事农业的斯巴达人连同他们的朴素知足,在希腊社会的后期,可以说很好地代表了希腊社会的原始状况。他们从来不想躲藏在一座围着墙垣的城里,以策安全。

可是在从事航海的地区,特别是那里的日益富裕起来的贵族和他们的国王,情形就不同了。他们有一切理由去防御那些随时都可以侵入沿海地带的海盗的袭击。为了保证更大的安全,那些过去一直分散地生活在自己田庄上的、富裕的豪门巨族聚集一起,迁到一个便于防卫而又是他们储藏珍宝的地方定居下来。这种集中居住使他们能够迅速集结,以便抵抗入侵者;而由于他们共同居住的地区范围狭小,也使他们有可能在四周建筑起一道坚固围墙。

这样就在航海者的国家中出现了城市。麦克斯·韦伯自己也认为,“城市最早正是作为贵族的居住地而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第530页)但是,这种说法和他认为豪门巨族只是在城市里和城市国家的国王一起兴起的这一观点,怎么互相协调呢?

不管贵族的兴起与他们居住的城市的兴起怎样密切,不管他们怎样忙于城市的事务,他们始终是拥有城外庄田产业的地主,并没有成为纯粹的城市人。

可是城市本身的繁荣却愈来愈不依靠贵族的地产。在这一方面,

希腊各国的城市，一般地是地中海沿岸尤其是地中海东岸国家的城市，和东方各大帝国的城市根本不同。东方的城市是广阔农业区的中心，远离海洋，而所谓古代西方的城市则总是沿海城市。东方城市的规模和繁荣取决于受统治阶级剥削的农业区规模的大小。

农业地区越广阔，提供给剥削者的剩余农产品的数量越多，城市中商人和手工业者就愈益兴旺。城市是完全依靠统治阶级的。

反之，希腊城市的势力和财富几乎根本不取决于受居住在城市里的贵族剥削的农民的人数，也不取决于贵族剥削的程度。希腊城市的重要性，它的商业和工业的重要性以及人口的增加，不依赖于那里的统治阶级所拥有的田庄的大小，而依赖于他们的船只航行范围的大小；依赖于船舶航行所经沿海各地的财富以及船舶所能发挥的军事力量。

雅典城的成长，不是由阿提卡的扩展所决定的。就我们从古代阿提卡的历史中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论，它的农业地区始终没有变动过。它的面积大约是二千三百平方公里，约有今天的安哈尔特自由邦那么大。反之，雅典城却成长得很显著，它的人口最后竟多过于郊区。贝洛赫估计，阿提卡的居民数字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约为二十万，其中就有十二万“或者更多的人”住在雅典和他的港口披莱乌斯。（《希腊史》，第3卷第1章第273页，274页）（又参看第3卷第2章第386页以下）

关于这种人口增长的原因，我们以后还会看到。

郊区的地主现在也成了市民，土地已成城市的附属物，而不是城市的基础。

农村很快就供应不起城市。城市只好指望从外面，即海外进口粮食。对雅典人来说，保证粮食进口，其中一部分来自埃及，但主要的是来自黑海沿岸各国，老早就成为一项重要事务。早在公元前610年光景，雅典人就占领了达达尼尔海峡的西盖隆（Sigeion），以便保证从黑海输入粮食。与此相反，东方大国生产的粮食不仅足以自给，而且还可以输出。古罗马在共和国时期以及在帝国时期，没有来自

埃及的粮食，就不能维持。

对于希腊人来说，城市和国家同是一个意思。希腊文 Polis 这个字既表示城市，又表示国家。这样便形成了城市国家（或称城邦）这个类型，城市国家既不同于东方的城市，也不同于东方的国家。

第二章 城市国家中的阶级斗争

城邦的政治特征，尤其是内政方面的特征，是符合于城邦的特征的。

我们已经指出，希腊的地理条件不同于东方国家的地理条件，这首先是由于东方的地理条件使许多农产丰富的小型共同体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在财富和权力上，都远远超过了劳动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希腊则只可能有一些大抵土地贫瘠的小国家。这些国家中的统治阶级，只要他们仅仅依靠剥削农民过活，数量就不大，收入也很微薄。他们既不能在文化上，也不能在权力手段上大大高过被剥削阶层。他们在许多方面同被剥削阶层的差别并不比今天富农和小农的差别更大。另一方面，这几千人住在一个狭小地区里比几百万人住在一个辽阔平原上要更容易彼此了解些。

在希腊，从来就没有过象东方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统治阶级面前所表现出来、并且自己也感觉到的那种奴隶般的屈从，我认为这首先要归之于上述的原因。太尔希特斯(Thersites)的著名故事，可以说是一个例证。

荷马的诗篇当然不能用作论证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的历史资料，可是对了解这些诗的产生时代的社会情况来说，却是极其宝贵的。当然，对于了解这些诗的最后编定时代的社会情况来说，也是如此。

这样我们也就不能把关于太尔希特斯的故事，看成是纯粹文学的虚构。假如听故事的人都认为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那么这样的故事就显得很可笑了。